

慢，但不是回到过去

□ 禾刀

埃里克森的《时间，快与慢》系统全面地剖析了加速发展方式引发的生存困难和社会畸变。作者试图以互联网和交通等飞速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阐明在这个快时代里，慢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在埃里克森看来，信息和交通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不知不觉中“夺走”我们的“慢生活”。比如大家疲于通过互联网掌握信息，尽管绝大部分信息对我们毫无用处。

第一次翻开这本书时，正坐在“飞”往老家的高铁上，顿时感觉内心十分矛盾：如果我要享受过去的慢生活，那么就必须要挤普通列车或者长途客车。之所以我更愿意选择高铁，主要看重两个因素，首先当然是节省时间，其次则是高铁无疑提升了旅途舒适度。就凭这一点，我虽不会全力支持快上加快的现代节奏，但同时也不完全赞成那种不问青红皂白，以为过去的“慢生活”就一定很幸福的观点。

为证明慢生活的巨大魅力，埃里克森频繁以“北欧四国”（芬兰、瑞典、挪威、丹麦）作为例证，比如极力推崇北欧人羡慕的小木屋。小木屋所处地理位置大都偏僻，有的还没有电视、电话和互联网。为了返璞归真，净化心灵，一些人入住小木屋后拒绝用电，甚至有人一进入小木屋后便摘下手表塞进抽屉，连时间一并抛到脑后……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紧张的生活慢下来。不过，我更愿意将此视为富裕社会下的休闲生活，事实上，“北欧四国”是闻名全球的高福利国家。

还有一个“围城”现象亦可说明这一现象。时下，国内许多农村人特别是“农二代”梦想搬进城市，整天饱受城市病困扰的城市居民却争相赶赴野外，以便远离城市持续“高位震荡”的PM2.5。众所周知，在城乡二元户籍历史“传承”下，我国城乡居民总体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差

距，大部分地区的财富集中在以城市为圆心的小半径里。于是，渴望致富的农民争相赶往城市，而有一定生活基础的城市居民则无此压力，于是外出休闲自然成为更高的追求。

没有人愿意整日奔波劳碌，疲于生计，更愿意作为生活的一个悠闲体验者，并不是农村人不懂得休闲，今天的许多景区，过去交通往往闭塞，农民生活并不富裕。农民与市民间的“围城”现象分野，并非在于懂不懂得休闲，而在于是否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很难想象，一个不得不疲于为生奔波劳碌者，会乐于忍受致贫的慢节奏。当然，这也并非就是一味吹捧快节奏。生活节奏过快肯定会透支人们的幸福，要不，过劳死现象为什么会成为现代社会的一大“杀手”呢？

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就像一辆汽车，有最大速度也有经济速度，最大速度可以最快达成效

率，但并不经济。而速度太慢会牺牲效率，不仅时间上不经济，油料成本同样不经济。这也就是尽管现在生活节奏太快，但没有人真正愿意回到过去那种充满迷茫的慢生活时代。衡量生活的快与慢，关键要看我们每个人的“经济速度”。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经济速度”既与每个人的生活理念和习惯密切相关，更深受我们时代背景特别是收入支配影响。倒是觉得，把精力放在研究我们“经济速度”层面，这或比简单讨论生活的快或慢更有意义。

如果“北欧四国”不富裕，成本不菲的小木屋不可能走俏。换言之，我们渴望放慢繁忙的脚步，但绝非开历史倒车，回到贫困的过去。

《时间，快与慢》
(挪威) 托马斯·H·埃里克森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新书导读



《现代世界的诞生》
[英] 艾伦·麦克拉伦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人类学家麦克拉伦以数十年潜心欧美亚澳等文明间的比较研究为基础，将自己毕生探索现代世界起源问题。他希望这可以帮助中国读者理解西方的历史与中国的现状。



《长相思3：思无涯》
桐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从《步步惊心》《大漠谣》《云中歌》《曾许诺》，到新作《长相思》，桐华的故事总是将精彩与虐心进行到底，让亿万粉丝为一个“情”字憧憬、感慨、动容乃至流泪。



《与上帝的契约》
胡安·高美 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

在隐藏50年后，曾以医学实验名义屠杀了700多名儿童的纳粹战犯格罗斯终于被中情局特工福勒找到，还从他那里拿回一件宝物——

达·芬奇的《哈默手稿》

□ 李和章

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和高等教育管理工作，我与大学学子们朝夕相处，众多的本科生甚至研究生经常问我，如今的青年该读一些什么样的书。如果现在有人这样问，我便会向他推荐《哈默手稿》。《哈默手稿》一书的作者是列奥纳多·达·芬奇。尽管他辞世至今已经有将近五百年，但是，他仍然是一个难以企及的传奇，或者，正如他的学生弗朗西斯科·梅尔兹所言，“造物者无力再造出一个像他那样的天才了。”他仅仅是一位物理学家吗？是一位艺术家吗？数学家吗？建筑师？音乐家？发明家？地质学家？植物学家？又或者，他是一位医学家吗？不，上述任何一个称呼用在他身上，都不会是对他其他方面的才能和技艺的不公，他是一位科学家！像大百科全书一样的科学家。

他的才华可以在《哈默手稿》一书中得以体现。

在这本书的第五十七页，他记录下这样的文字：“阳光照射到水面，水面整体反射出阳光。在水面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观察到很小的太阳图像，这样，水下太阳的影子比起天空中的太阳，显得特别小。如果眼睛可以观察到整个水层，可能看到整个水面太阳的图像层层叠叠，斑斓辉煌。”这段文字，简直超越了一般科普文字的水平，读起来既简洁又富有诗意，甚至还带有那么一些哲理的味道，而在它的旁边，则是他手绘的一幅日、地、月三者的照射与投影关系图，线条精准而寓意明了。

事实上，这本书的每一页所呈现给读者的，都是这样一种光怪陆离的新奇感，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是在阐述知识与科学。如今我们的生活里面，举手投足所能接触到的绝大多数物件，都来自于科学，科学似乎已经完全如空气和流水一



《哈默手稿》
(意) 达·芬奇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速读

经济数据中充满噪声

经济预测者在进行预测时，很少公开自己的预测区间，或许是因为这样做会降低公众对他们的专业知识的信任度。

大多数经济数据序列都需要修正，统计数据一经公布，修正工作可能长达数月甚至数年。修正工作有时是十分庞杂的。美国政府对2008年第四季度GDP增长的估计是这样：不算体面的例子，最初公布GDP仅下降了3.8%，现在又改为当时经济的降幅将近9%。如果白宫这些经济学家对经济漏洞的实际大小有所了解，他们就会在2009年1月强烈推行更大的经济刺激方案，或者他们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从长计议，而不是试图速战速决。

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同情经济预测者。预测经济发展趋势实属不易，但如果连经济预测从何处着手都不知道的话，那就难上加难了。经济是一个动态系统，不是一个方程式。

经济学家与气象预报员面对的挑战或许有些可比性，他们都面临着以下两个基本问题。第一，经济与大气一样，是动态系统。不同事物之间互相作用，这些系统都处于永久的运动当中。在气象学中，这个问题非常明显，因为天气系统符合混沌理论。从理论上讲，巴西的蝴蝶扇动一下翅膀，就会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引起一场龙卷风。在经济领域中也存在着大致相同的情况，日本海啸或是长滩港口工人罢工也会影响某个得克萨斯人是否能找到工作。

第二，气象预报受某些不确定的初始条件的约束。气象预报总是采用一种或然说的表达方式（比如降雨概率为70%），之所以采用这种方式，并不是因为天气本身存在随机性，而是

般，将我们的生活充满。但是，在五百多年之前，还远不是这个样子。然而，就从达·芬奇那个时代开始，这一切都改变了，人们开始普遍追求一些更加实用的东西，无论是在绘画中还是在文学中，无论是在学问中还是在生产中，在这种全新的社会风貌中，现代科学诞生了。

我们将这个时代叫做文艺复兴时代，虽然同一时期得到复兴的，绝不仅仅是文艺。那么，以这样一个时代，来反躬我们目前所身居的这个时代，我们会发现自己已经懒惰得多么不像样子，我们对科学和它的成果是如此地习以为常，以至于知其然，却不能知其所以然。这种恶劣的局面所导致的一个后果，便是一般民众与科学的距离相去日远，而其另外一个恶果，便是造成科学的后继乏力。当然，我所谓“科学”者，绝对不仅仅指制造科学。达·芬奇曾有一语，我为诸君言之，“智慧是经济的女儿”，以此与诸位共勉——现在有钱了，就多读一点书嘛！

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纪实图文新书《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讲述了1964年至1969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后、中国当代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毛泽东一系列重大政治决策与心理活动，其中也贯穿生活点滴细节。

作者顾保孜 是著名的红墙女作家，曾以《红墙里的瞬间》《红镜头》《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等优秀纪实文学作品而为广大读者熟知。本书是顾保孜沉潜多年，精心书写的一部力作，作者不仅采访了多名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掌握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同时也参阅大量史料文献，加以审慎判断，以细致入微的笔触，为读者还原了一段众说纷纭、颇为敏感的历史真貌；更在这部以丰富的历史细节支撑的书中，用理性客观的方式，解析了中国当代历史表象

“你在读什么？”这是前出版人士威尔·施瓦贝尔和他的母亲经常问彼此的一个问题。在母亲被诊断出胰腺癌之后，这个问题变得愈发紧迫起来。得知母亲的生命将要结束，威尔建议组成“读书俱乐部”，将两人以同读一本书的方式连接在一起。母亲病逝后，威尔将两年间母子两人“读书会”的交流过程记录下来，出版了《生命最后的读书会》。

这是儿子写母亲的鲜活而伤感的回忆录，以及两人献给书籍的情书。一本关于母子关系的书里，两人借助阅读，探讨了各种话题，彼此第一次深刻地理解了对方的选择。从热门惊悚小说到经典畅销书，从诗歌到悬疑故

□ 方舟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可谓内忧外患。国外是共产国际解体、苏联变革、国际政治形势动荡，国内是大跃进带来的隐患显现，自然灾害接连不断，政治、经济、文化都面临着严峻挑战，而中央高层此时又出现了思想认识的分歧，如何发展经济生产；如何对待各种关系而产生的矛盾；如何治党治国……一系列重大问题摆在毛泽东面前，引发了他对各种思潮的忧虑，进而思考日渐沉重，逐步夸大加剧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导致与国家主席刘少奇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加深，直到恶化，不可挽回……

领袖之间的矛盾、挫折与误区都有回避，在本书中得到了客观真实、淋漓尽致地展现，既不文过饰非，也不一味苛责。本书还收入了毛泽东专职摄影记者钱嗣杰先生所拍摄的一百余幅毛泽东

生命最后的读书会

□ 王舒

事，从异想天开到精神层次探讨……穿插着作者对儿时的回忆、母亲的不平凡经历、各自的人生际遇，借阅读，他们探讨了勇气、信仰、孤独、感恩、学习、倾听甚至葬礼等多个话题，分享着各自对文字和生命的态度与观点。

书中提及100多本经典文学作品，大多数国内已有中译本出版，其中不乏国内读者非常熟悉的《霍比特人》《面纱》《不可思议的一年》《刺猬的优雅》《龙文身的女孩》等书，书中的“我”和“母亲”如何看待这些书，给读者列了一个好书佳作的读书清单。

作者说：“这是专属于妈妈和我的双人读书会，借着分享和讨论这些书，让我认识一个不一样的母亲。这些书帮

助妈妈迈向她的死亡旅程，也帮助我留下妈妈的人生智慧，迈向未来生活中没有她的日子。”

这本书不仅歌颂了书籍在我们各自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作者对弥足珍贵的母子关系也作出了温柔感人、诚实生动的刻画——这本书是一曲对美好的颂歌，而那件美好的事，是“爱”。

作者威尔·施瓦贝尔是世界知名出版公司(Hyperion Books)的高级副总裁兼总编辑，也曾是《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出版过《长尾理论》、《你在天堂遇见的五个人》等知名作品。

《生命最后的读书会》
(美) 威尔·施瓦贝尔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数据时代的信号与噪声

□ 丽君 整理

因为气象学家认为他们对初始条件的测量不够精确。天气预测模型（由于符合混沌理论）对初始条件的变化极为敏感。同样的，在经济预测中，初始数据的质量通常都非常差。

然而，气象预报仍是真正成功的预测例子之一。由于人与机器的通力合作、更好的数据采集方法和一如既往的辛勤工作，不论是飓风轨迹预测还是日间高温预测，都比一二十年前准确多了。

对于经济预测来说，还能那么自信。对经济预测的任何幻想，都会被经济学家在金融危机之前所犯的重大错误打破。

经济学更偏向于人文科学。尽管经济学家对于控制经济运行的基本体系有着相当正确的理解，然而，经济运行中各种情况的因果关系仍然模糊不清，在经济泡沫期和经济恐慌期时尤其如此，因为此时的经济系统中充斥着人为因素决定的反馈环。

相反，如果你只把经济当作一系列变量和方程式，而没有看到其深层结构，那就很容易把噪声当成信号，误认为自己（还有那些轻信的投资人）正在作出准确的预测，而实际上你的预测并不准确。

地震预测中的数据

地震学家真正感兴趣的是含时预测，在含时预测中，地震发生的概率在一段时间内总会

出现波动。然而，即便是那些根本就不相信可以进行含时预测的地震学家也承认，地震的分布是有模式可循的，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余震的存在。几乎所有大地震之后都会发生几十次甚至几千次余震，这些余震通常遵循一个可预测的模式，一场地震发生后，余震更有可能随即发

生，而不是几天之后才发生，几周之后发生的概率就更低了。

然而，这种预测模式对于挽救生命并没有实质性帮助，因为根据定义，余震总是比最初的主震威力小。如果一个地震带发生了一场威力足够大的地震，通常会伴随许多小余震，然后地震会暂且告一段落。然而，有时情况往往不是这样。比如，1811年12月16日在密苏里州和田纳西州交界处的新马德里地震带发生了一场大地震，据地震学家评估，此次地震的震级为8.2级，6个小时之后，竟然又发生了一场震级为8.2级的地震。而该地震带仍然没有平静下来，继12月16日的两次大地震之后，1812年1月23日又发生了一场震级为8.1级的大地震，2月7日的地震的震级更是达到了8.3级。这几次地震中究竟哪些是前震？哪些又是余震？所有的解释似乎都不通。当然，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在地震发生之前就预测到，能否提前分清前震和余震。当我们跨越时间和空间观察地震分布数据时，这些数据似乎在诱使我们相信，在噪声中可能会找到信号。另一个更有争议的例子是2011年发生在日本的大地震。该地区地震发生的时间是否有模式可循呢？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例如，2008年中期，该地区发生了一系列震级为5.5-7.0级的地震，此后并没有发生更大的地震。但我们的确看到，2011年3月9日发生了一场格外剧烈的前震，震级为7.5级，55个小时后日本东北部发生了9.1级的大地震。

然而，只有一半地震有可辨识的前震。更复杂的情况是错误的预警，误认为地震活动高潮期是大地震的预警，结果却往往没有发生大地震。地震学家熟知的一个例子就是，2008年初发生在内华达州里诺市的一系列小地震。里诺的地震群和2009年拉奎拉附近的地

震群很相似，但结果却不一样。里诺的地震群中，最大的一次仅为5.0级，之后就没有更大的地震发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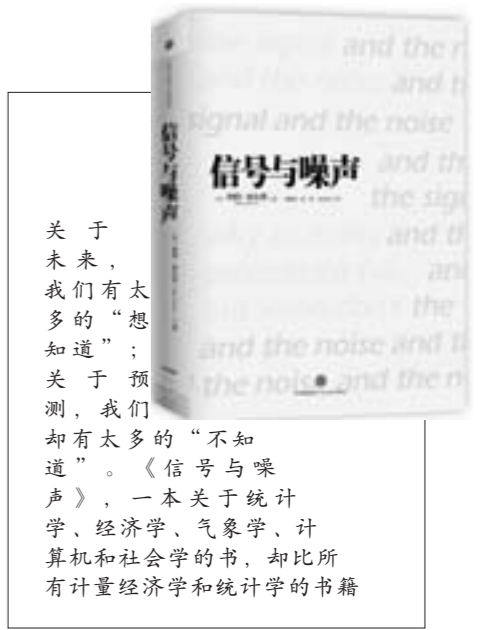
以上的数据让地震学家们感觉很难处理，但这只是冰山一角。数据似乎总处于一种让人陷入炼狱的状态，不是那么无规律，也不是那么可预测的。史上记载的关于地震预测的尝试，几乎全都是失败的。

大数据时代的预测更容易失败？

2005年，斯坦福大学的埃尼迪斯发表了一篇非常有影响力的文章，题为《为什么大多数发表的研究成果都是骗人的》。埃尼迪斯在文中引用了大量统计论据和理论论据，就是为了说明医学期刊和其他学术或科学领域中，大量被视为真实的假设实际上都是不真实的。

拜耳实验室发现，当他们试图利用实验再现医学期刊中的阳性结果时，却发现约2/3的结果都无法复制。检查一项研究是否真实的另一条途径是，看看在真实世界中能否作出准确的预测，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发现都无法作出准确的预测。各个领域，从地震学到政治科学，预测的失败率实际上相当高。埃尼迪斯说：“过去20年里，可供使用的信息、基因组学和其他技术皆呈指数增长，有几百万个有趣的变量供我们测量。因此，我们希望利用这些信息和使预测成真，但我们新发现的数目明显比上述论文的数量，在创造新知识方面，大部分论文所作出的贡献真是微不足道。”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预测在大数据时代更容易失败。拥有的信息量呈指数增长，需要验证的假设也正在以同样的速度增长。比如，美国政府现在发布了约45000份关于经济的统计数



关于未来，我们太多的“想知道”；关于预测，我们却有太多的“不知道”。《信号与噪声》，一本关于统计学、经济学、气象学、计算机和社会学的书，却比所有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的书籍

据，如果你想要探究这些统计中所有两组合之间的关系，则需要对10亿个假设进行验证。但是，数据中那些有意义的关系组合——这里指的是因果关系而非相关性组合，而且这些组合能够证实这个世界是如何运转的——少之又少，增长的速度也不及信息本身的增长速度快，如今的真实信息也并不比互联网和印刷机问世之前多多少。大多数数据都只是噪声，就像宇宙的大部分都是真空区一样。

如果我们不够小心，错误的判断就会主导事件的结果。不幸的是，就像埃尼迪斯指出的那样，大部分进行统计学检验的领域所发表的研究著作，其中大约有2/3的发现被认为是真实的发现，其实是错误的。原因有很多，有些与我们的心理偏见有关，有些与普遍的错误方法有关，还有一些与错误的动机有关。然而，归根结底是因为这些研究应用的统计学思维方式存在缺陷。

《信号与噪声》
(美) 纳特·西尔弗著
中信出版社